

邓红/著



王充新八论

WANGCHONG
XINBALUN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邓红／著

王充新八论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王充新八论/邓红著. —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
2003.1

ISBN 7-5004-3660-2

I. 王… II. 邓… III. 王充-哲学思想-研究 IV. B234.8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98523 号

责任编辑 郭 媛

责任校对 尹 力

封面设计 毛国宣

版式设计 戴 宽

出版发行 **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**
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

电 话 010—84029453 传 真 010—64030272
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om.cn>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

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8.5 插 页 2

字 数 220 千字 印 数 1—2 000 册

定 价 20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町田序

《论衡》是一部敏锐、奇特而又十分有趣的著作。我很早以前就想在什么时候能够将之全部精读一遍，并弄清处于前后汉之要冲的王充思想在思想史上的地位。

我们日本的中国思想研究，到战前为止占主流地位的是经学和朱子学，其次是诸子学和魏晋玄学，其他的都被认作是旁门支流。尽管阳明学和道教研究等方面也取得过显赫的成果，也涌现出了一些热心的研究者，但这些并没有真正得到学术界的认可。战后的一段时间里也残留着这样的倾向。打破这一现状的是利用《史记》和汉初的零星资料而完成的金谷治的《秦汉思想史研究》。这一研究证明，在以儒学为中心形成的思想史研究之外，利用所谓次要的或旁流的资料也完全可以展开真正的研究。

从此，在许多领域里，以前被忽略的一些思想家和典籍，得以被单独重新估价。道教研究就是从所谓学术界得到“公民权”的一个好例子。前后汉的研究领域也从此时开始得到新的开拓。

邓红君在这一新开辟的领域里勤奋耕耘，从前汉到

后汉，精力旺盛地发表着论考，成果昭著。

邓红君是 1987 年来日本的，翌年春天考上九州大学的硕士研究生，专攻中国哲学。在硕士、博士学习期间他认真攻读、踏踏实实地增长了实力。1995 年他的关于《春秋繁露》的综合性研究以“董仲舒思想研究”为题，获得了九州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。1995 年 9 月被大分县立艺术文化短期大学聘为副教授至今。同年又用日语出版了《董仲舒思想之研究》一书，博得了学界的广泛好评。多年以前，有个东京大学的教授知道了邓红君的留学生活和研究进展之后，曾对我称赞邓君是“留学生之星”。其实当时我就认为，邓君不仅是留学生、也应是其他年轻学生效法的榜样。

现在，邓红君关于被称为后汉的异端儿的王充的研究又问世了。邓红君在硕士学习阶段专攻过王充，近些年他又转回到了王充研究。从反思胡适以来的王充研究开始，他先后发表了“天地论新议”、“批判论新议”等论文，又写下了其他一些论考。前些日子得知这些成果将在中国结集付梓刊行，感到非常高兴，应邓君之邀特写此序奉上。

本书的刊行必然对中国的王充研究乃至前后汉研究投下一石波纹，也许是一场轩然大波；同时它也会刺激我们日本的王充研究，促进研究的活性化。回顾对照彼此的已有研究成果，可以想见从此书的出版开始，王充研究可能会有新的展开。如果真能如此的话，我会感到无比的欣慰。

庆贺本书的出版，祝邓红君今后能取得更大的成果。

日本九州大学名誉教授 町田三郎

2002年8月5日

王 序

—

我与邓红兄的友谊，从1978年3月开始，至今已有25年。开始，我们作为“文革”后的第一批大学生，在武汉大学历史系度过了半年的同学生活。当时，我与邓红兄同班、同寝室，关系应该较为近密。但由于性格不太一样，平时交流却不太多。他思路敏捷，活泼好动，尤其喜欢与人辩论。睡在我上铺的另一位同学吴遇，是著名史学家吴于廑先生的公子，口齿伶俐，也喜欢辩论。因而，每天晚上熄灯后，他俩总要就一些问题，辩论几十分钟才就寝。我当时就经常想：邓红兄真是学哲学的好材料，学历史实在是太委屈他了。

半年后，我离开“七七级”，考取同系著名史学家唐长孺先生的研究生。虽然与邓红兄不再同班、同寝室，但研究生宿舍和本科生宿舍距离很近，又在同一所食堂吃饭，仍能经常见面。1981年秋，我研究生毕业，分配到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工作。1982年春，邓

红兄也毕业了，分配到中共四川省党校工作。本以为南北悬隔，难以见面。没想到，几年后，大约是 1987 年初，邓红兄又突然来到北京，说是办手续，要东渡日本求学。当时，在北京的武汉大学历史系同学，为邓红兄组织了一个小小的聚会，算是为他壮行。此后，邓红兄一走就是七年，虽然不是音讯全无，但详细情况却不得而知。直到 1994 年，他学成返乡（四川）探亲，途经北京，专程到沙滩红楼找我，我们才再次会面。记得我请他在沙滩附近的一家餐馆吃饭，他向我简单介绍了七年来他在日本学习的情况。我得知他终于改以中国哲学史为专业，并在这个学术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绩，不禁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。

此后，邓红兄有机会经常回国，我们也有机会经常见面和聊天。当他告诉我，他的老师（町田三郎先生）的老师是大名鼎鼎的金谷治先生时，我感到他确实学有师承，取得成绩并非偶然。这是因为，我较为了解金谷治先生，与金谷治先生一直保持很不寻常的忘年之谊。那是 1984 年，我受业师唐长孺先生嘱托，整理敦煌吐鲁番出土的《论语郑氏注》，初次发表了一篇关于《论语郑氏注》的研究论文^①。当时中国开放未久，我孤陋寡闻，还不知道金谷治先生也是整理、研究《论语郑氏注》的大家，且曾发表、出版不少整理和研究《论语郑

^① 王素：《敦煌文书中的第四件〈论语郑氏注〉》，《文物》1984 年第 9 期，第 62—64 页。

氏注》的论著^①。金谷治先生读到我的文章，也许感到有些新意，写信给著名史学家周一良先生，了解我的情况。周一良先生将信转给了我。于是，我与金谷治先生有了书信往来。金谷治先生将他有关《论语郑氏注》的论著陆续寄赠给我，我也将收录新出《论语郑氏注》的《吐鲁番出土文书》（第六至第九册）陆续寄赠给他。后来，我整理、研究《论语郑氏注》，撰成《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》一书^②，特别将金谷治先生的长文《郑玄と〈论语〉》译为中文收入其中^③。金谷治先生也在一些论文中多次记述了他与我的友谊。^④ 金谷治先生植学深厚，治学严谨，不仅享誉东瀛，而且蜚声中华。日本的学术界极重师承。邓红兄作为金谷治先生的再传弟子，自然会因袭家法，光大门风。

2001年10月，我应邀访日，特别到九州的大分市看望邓红兄。他驱车带我畅游了别府的温泉，中津的福泽旧居，竹田的冈城遗址、泷廉太郎纪念馆，阿苏山的活火山口、阿苏神社，以及熊本的高千穗峡谷等名胜古

① 金谷治：《论语孔安国注の問題——敦煌本郑注との关系をめぐって》，《汉魏文化》第2号，1961年；又《唐抄本郑氏注论语集成》，东京平凡社，1978年。

② 王素：《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》，北京文物出版社，1991年。

③ 金谷治：《郑玄と〈论语〉》，原文载前掲《唐抄本郑氏注论语集成》，第379—408页；译文载前掲《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》，第204—243页。

④ 金谷治：《アスタナ出土论语の郑注について》，《东方学会创立五十周年纪念 东方学论集》，东方学会1997年版，第401—413页；又《山庄的国际交流——〈郑注论语〉との出会い》，《论语と私》，东京展望社2001年版，第22—26页。

迹。一路上，他不时向我提到他正在根据东汉王充的惟一著作《论衡》撰写的新著《王充新八论》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2002年8月，他的《王充新八论》终于完稿，并交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准备出版。他请我作序，我自然欣然同意。

二

如所周知，关于王充其人及《论衡》其书，自古至今，研究、评说者，可谓颇不乏人。但谈到观点，却是见仁见智，多不相同。

关于王充其人，严格来说，记载并不很多。主要是由他本人所撰略带自传性质的《论衡》卷三〇《自纪篇》（全文见《王充新八论》的《总论王充》）。范晔《后汉书》卷四九《王充传》（同前）虽有一些新材料，谢承、袁山松等《后汉书》（辑本）也有一些零星记载，但由于与《自纪篇》所述不太吻合，一直颇有争议。而这种争议，往往涉及对王充个人的评价。譬如，《王充传》称“充少孤，乡里称孝”，而《自纪篇》先云：

世祖勇任气，卒咸不揆于人。岁凶，横道伤杀，怨仇众多。会世扰乱，恐为怨仇所擒，祖父泛举家檐载，就安会稽，留钱唐县，以贾贩为事。生子二人，长曰蒙，少曰诵，诵即充父。祖世任气，至蒙、诵滋甚。故蒙、诵在钱唐，勇势凌人。未复

与豪家丁伯等结怨，举家徙处上虞。

然后用了很多篇幅，盛赞自己如何从小贤良好学，长大圣洁不染。是故，唐刘知几很早就指出：

王充《论衡》之《自纪》也，述其父、祖不肖，为州闾所鄙，而已答以瞽顽舜神、鲧恶禹圣。夫自叙而言家世，固当以扬名显亲为主，苟无其人，阙之可也。至若盛矜于己，而厚辱其先，此何异证父攘羊，学子名母，必责以名教，实三千之罪人也。（《史通》卷九《序传》）

到了清代，指责者更多。惠栋（《后汉书补注》）、王鸣盛（《十七史商榷》）、钱大昕（《十驾斋养新录》）等为著名代表。其中，王鸣盛所言最为直白，曰：

《王充传》：“充少孤，乡里称孝。”案：充《自纪篇》历诋其祖、父之恶，恐难称孝。

从个人德行上否定王充，在当时可以说已成潮流。

然而，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，黄晖先生整理《论衡》，开始为王充翻案。他先据《御览》引《王褒集·僮约》注云：“汉时官不禁报怨。”再据桓谭疏称：“今人相杀伤，虽已伏法，而私结怨讎，子孙相报，后忿深前，至于灭户殄业，而俗称豪健，故虽怯弱，犹勉而行

之。”最后为之辩曰：“是世风所尚，非可谓其意在诋毁也。”^①但王充历诋父、祖，与两汉俗尚报怨，实际是两回事。黄晖先生所辩文不对题，自然难以受到学者重视。因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，台湾的徐复观先生对王充进行全面批判，不仅对前述“乡里称孝”仍然怀疑，对范曄《王充传》及谢承、袁山松等《后汉书》关于王充“受业太学”、“师事班彪”、“屏居教授”、“谢夷吾推荐”等一系列记载，也都表示不可信^②。尽管徐复观先生对王充的研究卓有成绩，被学者赞为“对于五四以来浅薄的理智主义之学风，也是一个有力的针砭”^③，但我个人仍然认为，对《自纪篇》之外有关王充的记载全面推翻，恐怕不太妥当。即如“谢夷吾推荐”之后，“肃宗特诏公车征”，《三国志》卷五七《吴书·虞翻传》注引《会稽典录》称“征士上虞王充”，也可与之印证。显然，并非《自纪篇》之外有关王充的记载都不可信。因为，《自纪篇》虽然略带自传性质，但毕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传，其中存在省略是可以理解的。而研究王充其人，不能仅因个人德行存在问题，而连带一些含有褒义的个人记载也全都予以否定。因此，我个人认为，综合《自纪篇》及其他有关记载，结合前贤正反两方面

① 黄晖：《论衡校释·自纪篇》，中华书局重印本1996年版，第1188页。

② 徐复观：《两汉思想史》第2卷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（据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版再版），2001年版，第346—351页。

③ 蔡仁厚：《徐复观先生的学术通识与专家研究》，《毅圃》第7期，1996年。

观点，对王充其人进行研究，应该还有不少工作可做。

关于王充其书，也就是《论衡》，洋洋三十卷、八十五篇，与其人相比，也同样难以评判。前引《后汉书》本传说：

（王）充好论说，始若诡异，终有理实。以为俗儒守文，多失其真，乃闭门潜思，绝庆吊之礼，户牖墙壁各置刀笔。著《论衡》八十五篇，二十余万言，释物类同异，正时俗嫌疑。

《后汉书》虽然成于南北朝，但其材料均有所本。本传云，反映的是汉晋学者对《论衡》的评判。尤其“释物类同异，正时俗嫌疑”二句。东汉时期，经学昌盛，学者重视名物诠释。而《论衡》引事举例，或与通说不同（如武王伐纣、召公享年等），或于传世典籍无征（如以十二生肖配十二支等），形同“异端邪说”，在十分正统的东汉经学界，犹如空谷足音，自然容易受到学者的重视。同传注引谢承《后汉书》载谢夷吾推荐王充有云：

（王）充之天才，非学所加，虽前世孟轲、孙卿，近汉扬雄、刘向、司马迁，不能过也。

需要强调的是，此处名为推荐王充，实则推荐王充之书。谢夷吾可以说是《论衡》的最早知音。此后，还有汉末魏初的大学问家蔡邕、王朗，他们推崇《论衡》，也是因为

书中的“异端邪说”。如同注又引袁山松《后汉书》云：

（王）充所作《论衡》，中土未有传者，蔡邕入吴始得之，恒秘玩以为谈助。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，又得其书，及还许下，时人称其才进。或曰：不见异人，当得异书。问之，果以《论衡》之益，由是遂见传焉。

其中，蔡邕似乎尤为欣赏。如同注又引葛洪《抱朴子》云：

时人嫌蔡邕得异书，或搜求其帐中隐处，果得《论衡》，抱数卷持去。邕丁宁之曰：“唯我与尔共之，勿广也。”

此外，《抱朴子·外篇》还称《论衡》为“冠伦大才”，并用很多篇幅为之吹嘘，《论衡》在很长一段时间，被各类典籍广泛征引^①，也大致肇因于此。然而，大家在竞相征引的同时，似乎都忽略了如下问题：《论衡》为

① 如赵宋以前，征引《论衡》的著作，经学类有《尔雅疏》、《周易要义》、《尚书正义》等，史学类有《史通》及《史记》（三家注）、《汉书》（颜师古注）、《后汉书》（李贤注）等，杂撰类有《颜氏家训》、《酉阳杂俎》、《容斋随笔》、《困学纪闻》等，道教类有《抱朴子》、《云笈七签》等，佛教类有《弘明集》、《广弘明集》、《法苑珠林》、《翻译名义集》等，其他还有《水经注》、《唐律疏议》、《意林》、《隶释》、《太平御览》等。

何能够记载很多“异端邪说”？这些“异端邪说”是否可信？

按：《论衡》为何能够记载很多“异端邪说”？这些“异端邪说”是否可信？这关系到《论衡》原材料的来源及可信性，可以说是非常重要而且需要解决的问题。而关于前者，我一直觉得，可以从地域方面寻找原因。譬如：王充为会稽上虞人。他的同乡、会稽山阴人赵晔，也喜欢“异端邪说”。《后汉书》卷七九《儒林下》本传云：

（赵）晔著《吴越春秋》、《诗细》、《历神渊》。

蔡邕至会稽，读《诗细》而叹息，以为长于《论衡》。邕还京师，传之，学者咸诵习焉。

赵晔的《诗细》，因为早已失传，内容不得而详。蔡邕既然以之与《论衡》相比，认为比《论衡》走得还远，似乎性质与《论衡》比较相近。赵晔的《吴越春秋》，基本保存下来了。我们知道，《吴越春秋》喜欢收集民间传说，内容颇近小说，而所记越国世系，也与《史记》多有不合，虽有元徐天祐作音注，对事迹异同做了考证，但其可信性仍有问题，与《论衡》有一定的可比性。《三国志》卷五七《吴书·虞翻传》注引《会稽典录》将赵晔与王充并称，云：

有道山阴赵晔，征士上虞王充，各洪才渊懿，

学究道源，著书垂藻，骆驿百篇，释经传之宿疑，解当世之盘结，或上穷阴阳之奥秘，下摅人情之归极。

也说明此二人属于同类。明人钱福撰《重刊吴越春秋序》云：

《吴越春秋》乃作于东汉赵晔，后世补亡之书耳。大抵本《国语》、《史记》而附以所传闻者为之。元徐天祐……谓其不类汉文者，其字句间或似小说家。观《儒林传》称其所著，复有所谓《诗细》者，蔡邕读而叹息，以为长于《论衡》。今《论衡》故在也，鄙俚怪诞者不少，则东汉末亦自有此文气矣。^①

钱福注意到《吴越春秋》来源“传闻”，而《论衡》也“鄙俚怪诞者不少”，二者可以进行比较，堪称颇具慧眼。但认为原因是“东汉末亦自有此文气”，却不太正确。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：

自战国驺衍传大九州之说，至秦始皇、汉武帝时方士迂怪之论，据太史公书所载，皆出于燕、齐之域。盖滨海之地应早有海上交通，受外

^① 赵晔：《吴越春秋》卷首，《四部丛刊初编》，商务印书馆 1922 年版。

来之影响。以其不易证明，姑置不论。但神仙学说之起原及其道术之传授，必与此滨海地域有连，则无可疑者。故汉末黄巾之乱亦不能与此区域无关系^①。

陈寅恪先生认为燕、齐之域属滨海之地，应早有海上交通，受外来影响，堪称卓见。实际上，会稽也属滨海之地。不同之处是：燕、齐的海上交通和外来影响不易证明，会稽的海上交通和外来影响却是可以证明的。如：《后汉书》卷三七《桓荣附鸾子晔传》云：“初平中，天下乱，避地会稽，遂浮海客交阯。”同书卷四五《袁安传附玄孙忠传》亦云：“后孙策破会稽，忠等浮海南投交阯。”说明会稽与交阯（今越南）很早就有一条海上交通之路。此外，《三国志》卷四七《吴书·吴主传》黄龙二年正月条云：

遣将军卫温、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。亶洲在海中，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，求蓬莱神山及仙药，止此洲不还。世相承有数万家，其上人民，时有至会稽货布，会稽东县人海行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。所在绝远，卒不可得至，但得夷洲数千人还。

^① 陈寅恪：《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》，《金明馆丛稿初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，第 1 页。